

义理与考据

——思想史研究中的价值关怀与实证方法

姜广辉 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义理与考据:思想史研究中的价值关怀与实证方法/姜
广辉著.—北京:中华书局,2010.1

ISBN 978-7-101-07150-4

I.义… II.姜… III.思想史—中国—文集 IV.B2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30502 号

-
- 书 名 义理与考据
——思想史研究中的价值关怀与实证方法
- 著 者 姜广辉
- 责任编辑 石 玉
-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 版 次 2010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规 格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7 $\frac{1}{8}$ 插页 2 字数 410 千字
- 印 数 1—2000 册
-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07150-4
- 定 价 43.00 元
-

序言：思想史研究与考据学方法

——姜广辉先生在中国思想史研究上的成绩

林庆彰〔1〕

中国大陆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前，学术研究基本受启蒙心态支配，传统文化更多地被看作负面的惰性的力量。那时具有批判、启蒙意义的学术观点往往受到读者的推重，那是一个重视思想的时代，在此方面出类拔萃的学者甚至会被视为精神的导师。然而到了九十年代，学术取向发生了一种转变，学者开始发掘传统文化的正面价值，学术界更看重实证的学问，一种学术观点只有能得到实证方法的支持，才会被接受和认可，而架空立论的方法不免受到质疑和鄙弃。这时一些体现实证学问的学术门类如关于传统经学和出土文献的研究，由冷僻而转向热络，逐渐成为显学。姜广辉先生便是此一时期的佼佼者。

姜广辉，197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著名历史学家侯外庐先生修中国思想史。1981年毕业后长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思想史研究室从事研究工作。历任助理研究

〔1〕 广辉按：林庆彰先生，台湾著名学者，台南人，专精经学史与文献学。现任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研究员，兼任《国际汉学论丛》与《经学研究论丛》主编。著有《明代考据学研究》、《明代经学研究论集》、《清初的群经辨伪学》、《清代经学研究论集》、《丰坊与姚士粦》等专著。

员、副研究员、研究员、中国思想史研究室主任等职，并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中国哲学》主编、《朱子学刊》主编等职务。最近调入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任教授。

姜先生的学术研究起步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在九十年代中期之前其学术研究方向主要是宋明理学史与清代学术思想史，自1996年始转入中国经学思想史大型计划的研究与撰写；而自1998年由于《郭店楚墓竹简》与《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的陆续出版，他又将经学研究战国楚竹书研究结合起来，发表了许多篇具有真知灼见的学术论文，受到国际学术界的瞩目，为此曾先后应邀到日本、美国、法国等国家讲学。下面将其近三十年的学术研究成果作一扼要介绍。

一、关于理学、“实学”的研究

宋元明清时期是中国哲学思想的一个颠峰期，而关于此一时期的哲学流派、思想学说的性质、特点如何概括，其学术价值如何评估，学术界颇多歧见。然而其中有些问题自有历史本身的意涵，并不全随解释者的言人人殊而终无定论，关键在于如何去发现它和把握它。姜广辉先生在学术研究上重视“决疑”，因而能在一些学者普遍关注的问题中发现疑点，深入搜证，从而有一些突破性的学术建树。

首先是关于“道学”、“理学”概念的缘起问题，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几乎每次宋明理学研讨会上都会讨论到。相关学术著作对于道学和理学的解释不能令人满意。姜广辉先生用了十多年的考证工夫终于找到关键性的资料，从而写出《宋代道学定名缘起》一文，此文后来发表于《中国哲学》第十五辑。他提出，宋明理学意义上

的“道学”概念，其发明权应该归于北宋时期的王开祖，其重要的证据是南宋宝谟阁待制陈谦所提出的论断，陈谦说：王开祖“发明经蕴，倡鸣‘道学’二字，著之话言，后四十余年，伊洛儒宗始出”。与陈谦同时代的许及之也作过近似的论断。这篇文章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现在许多讨论宋明理学概念缘起的论著，都会提到这篇文章。此文后来收入姜广辉先生的专著《理学与中国文化》，更名为《“道学”、“理学”、“心学”定名缘起》，其文又扩展到对“理学”、“心学”定名缘起的解释。

其次，“实学”概念的历史内涵，也曾是学术界普遍关注的问题。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至九十年代初，学术界关于“实学”发表了许多讨论文章，也召开过若干大型的学术会议。但学者关于“实学”的说解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姜广辉先生对此类说解多不敢信从。1992年9月姜广辉先生应邀到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访问，作了《明清实学研究现况述评》的学术报告，访问期间在参观历史语言研究所电子版二十五史操作演示时，得到该所同仁帮助，获得二十五史中关于“实学”的全部资料，后来姜先生自己又搜集了两宋至明清时期著名学者文集中有关“实学”的资料，写就了《“实学”考辨》一文。姜先生指出，“实学”概念最早由唐代宗时期的杨綰提出，它主要是针对唐代以诗赋取士所形成的“浮竞”风气而言的。“实学”概念的完整意义包括通经、修德、用世三项，检视历史上大量关于“实学”的资料，可知后世学者关于“实学”概念的认知，大体不出此一范围。这篇论文最初发表于《国故新知：中国传统文化再诠释——汤用彤先生诞辰百周年纪念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中。上海复旦大学朱维铮教授曾致函作者，称“大作批评时贤言‘实学’之涵义谬误，证据确凿，逻辑无懈，甚有理致，洵佳作也”。台湾大学夏长朴教授也致函作者说：“大著……举证详审，论述精要，不枝不蔓，颇有一扫荆棘、力除蔓草，还实学

以本来面目之宏博气概，佩服，佩服！学术讨论贵在平心静气，就事论事，虽一时不足以服人之口，然证据确凿，他日终必为学界所接纳共信也。”此文后被选入《二十世纪中国文史考据文录》之中。此文颇为研究“实学”的学者所援引。

二、关于经学的研究

中国大陆五十年代以后很少有研究经学的学者，经学几成绝响，而思想文化界普遍接受了“五四”以来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经学是“封建教条”或“封建糟粕”。从1996年开始，姜广辉先生领导了一个三十余人的经学研究团队，实施了有关传统儒家经典诠释的大型研究计划，此计划的最终研究成果为四卷五册约300万字的《中国经学思想史》著作，2003年出版了第一、二卷，第三、四卷即将出版。姜先生通过此书的《前言》和《绪论》表达了他们关于传统经学的新认识，他们认为，儒家经典在主体上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性格，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集中体现。儒家六经是中国文化的源头活水，它反映了中国先民对人类所关心的重大问题如自然、社会、人生的思考，具有多方面的原创性，由此而形成中华民族认识世界和把握世界的思维方式。中国思想史是以不断对原典进行重新诠释的形式开展的。经典诠释活动并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总是陈陈相因的，不同时代的经典诠释活动常常反映出人们在新的与旧的、活的与死的之间进行选择的制度焦虑和人生焦虑，一部经典诠释的历史，即反映一社会共同体文化思想“托古改制”、新陈代谢的历史。姜先生不只是此书的主编，也是此书主要的研究和撰写者之一，书中许多重要的篇章是由他来执笔的。《中国经学思想史》与传统意义的经学史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即传统的经学史偏重

于讲经学的传承,而忽略传承者对经学所把握的意义。而《中国经学思想史》一书则着重于讨论传统经学的价值与意义问题。正如中国大陆著名学者余敦康教授对此书的评价:本书“着眼点在于经学的价值体系问题,此价值体系由长期的历史发展而形成,代表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一种在世界民族文化之林中独具个性的生存样法,通过口耳相传到写成文字,确立为经典。在往后的历史发展中一方面表现为动态的开放的过程,不断地丰富扩展,同时又表现为向本源的复归、对核心价值观的坚守执着,由此而展现为一部仪态万千异彩纷呈的中国经学思想史。这种卓见通识彻底改变了学术界沿袭已久的成见,把经学置于一种全新的视角重新认识,提出了一系列不同凡响而又令人信服的论点,在理论上产生了极大的突破”〔1〕。《中国经学思想史》一书的出版,也引发了学术界关于中国哲学史与传统经学关系的一些新的思考。近年姜先生又撰文谈中国哲学史(思想史)与中国经学史的关系说:“检讨和反思八十年来中国哲学史和思想史的研究状况,我们得到这样一种认识:以往的中国哲学史(或思想史)缺少‘根’,即经学,而以往的中国经学史又缺少‘魂’,即价值和意义,因此要想写一部有‘根’的中国哲学史(或思想史),须先写一部有‘魂’的中国经学思想史。”〔2〕

三、关于战国楚竹书的研究

《郭店楚墓竹简》与《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也许是晋太

〔1〕 参见姜广辉《继承侯外庐的中国思想史研究事业——写于〈中国经学思想史〉第一、二卷出版之际》,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3年10月30日。

〔2〕 参见姜广辉《经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4年3月23日。

康年间汲冢竹书出土之后所发现的最重要的两批思想史文献,其学术价值弥足珍贵。对这两批出土文献的释读与整理,古文字学家与古文献学家自然当居首功。而随后关于这两批文献的思想内容分析与学术价值评估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两批文献甫一出版,姜先生作为《中国哲学》主编与中国思想史专家,即积极组织学者共同研究,姜先生本人也撰写多篇论文,从不同角度对两批文献提出理解和诠释的向度。兹举数例:

(一)姜先生在《郭店楚简与早期儒学》一文中提到,顾炎武曾指出,周贞定王二年(公元前467年)至周显王三十五年(公元前334年)凡一百三十三年间“史文阙轶,考古者为之茫昧”。郭店楚墓竹简的出土正好可以填补其中的部分“阙轶”。《孟子·滕文公上》:“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姜先生提出,由孟子的言论可以认为陈良是南传儒学的宗师之一。从郭店一号墓随葬品中有大量儒家文献看,墓主可能是与陈良有学术渊源关系的人,为此他提出以陈良作为墓主的参考坐标。

(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有一篇《周易》,可以视为迄今发现的《周易》最早的版本,其中有六种特殊符号,学者或认为是失佚了两千年的易学符号。其形式、内涵有着特殊的意义。为此,姜先生撰写《上博藏楚竹书〈周易〉中特殊符号的意义》一文,通过建立“理论模型”的方法分析这些特殊符号的分布状况,指出楚竹书《周易》的卦序与今本《周易》的卦序是大致相同的,其特殊符号将六十四卦约分成七个“卦区”,其目的很简单,主要是为了方便筮人从六十四卦中迅速翻检到某一卦,可能并没有其它更多的意义。因此也就不必将这些特殊符号看作原始《周易》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

(三)《古文尚书》真伪问题是经学史中的一大公案。《古文尚

书》考辨之所以困难,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缺乏真《古文尚书》的直接资料。《郭店楚墓竹简·缁衣》与《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缁衣》相继出版,其中引用的十条《尚书》文句,可以视为先秦古本《尚书》的内容。借助这些新资料可以对《古文尚书》的考辨工作有所推进。为此,姜先生撰写《〈尚书〉今古文真伪新证》一文,将两种出土文献《缁衣》与今传本《礼记·缁衣》以及今传本《尚书》的相关内容比勘分析,补证、支持了清代学者阎若璩的两个意见:一、今传《古文尚书》确有作伪之嫌;二、郑玄所注者为真《古文尚书》。由此可见楚简《缁衣》资料的珍贵价值。

(四)姜先生还在《郭店楚简与早期儒学》一文中提出重新审视儒学的“道统”说。文中指出,宋明理学家宣称发现了孔孟“道统心传”,但宋明时期几个有代表性的心性理论,无论是朱熹的重“性”(性即“天理”)说,还是王阳明的重“知”(知即“良知”)说,抑或刘宗周的重“意”说,验之于《郭店楚墓竹简·性自命出》篇,皆不符合早期儒学的思想。为此,姜先生提出,如果承认有原始儒家的“道统”的存在,其内涵应是由“大同”说的社会理想、“禅让”说的政治思想和贵“情”说的人生哲学所构成的思想体系。后世继承“道统”的不是汉、唐、宋、明的儒者,真正继承“道统”的倒是以黄宗羲、戴震、康有为等人为代表的清代儒者。从今日的观点看,儒学先秦、清代两段有许多人民性、民主性的精华。

这部论文集题名为《义理与考据》,选录了姜广辉先生二十余年间撰写的23篇论文,反映了姜先生治思想史既重视价值关怀,又重视实证方法的两个侧面。思想史毕竟是关于“史”的研究,对于历史的研究不能没有价值关怀,但若没有实证方法的支持,价值关怀便会架空立论。近几十年来,学者研究思想史,比较强调方法论的创新和突破,其实,传统的考据学仍是学术研究的基本的和重要的研究方法。

广辉兄与我同于 1948 年出生,我们虽然生活在两种不同的环境中,但境遇亦有类似之处。广辉兄因经历十年“文革”天翻地覆的社会大变动,蹉跎了大好的学习时光。我虽未有广辉兄那样的经历,却因数十年的戒严,大陆出版品被全部查禁,而处于无知的状态中。我们同样以坚忍不拔的毅力,为传统文化,特别是经学的复兴努力奋斗。以前从历史和地理课本中所得知的中国大陆,心想在往后有限的岁月中,大概无法亲历其境了。没想到姗姗迟来的开放,让我有跟广辉兄请教的机会,我们珍惜这份难得的缘分。广辉兄要出论文集,要我作序,我岂敢。为了不违背他的好意,乃略述广辉兄近年的学思历程,一方面表达我对他的敬意,另方面作为治学的警惕。

2007 年 5 月

林庆彰志于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
经学研究室

一、简帛学

郭店楚简与早期儒学

一、郭店楚简儒家文献研究的参考坐标

1993年10月,在湖北省荆门市郭店村的一座战国时期的楚国贵族墓葬中(考古学界命名为郭店一号墓),出土了一批竹简。经过古文字专家的整理识读,楚简图版及释文已于1998年5月由文物出版社发行,书名定为《郭店楚墓竹简》。《郭店楚墓竹简》有道家著作两种四篇,即《老子》三篇、《太一生水》一篇;有儒家著作(简称“儒简”)十一种十四篇,即《缁衣》、《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五行》、《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六德》、《语丛》四篇。

《郭店楚墓竹简》发表之后,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很大的反响。海外学者誉之为“中国的死海遗书”。

从《郭店楚墓竹简》本身而言,有相当大的解释空间。而从已经发表的论文看,可以说见仁见智,异彩纷呈。每位学者的见解都可以说是个人观点,我们很难说在什么问题已经有了定论。在研究中大家发表不同意见,可以广开思路,但我们也不希望发表的意见太过离谱。在研究过程之中难免有推测的成分,问题是哪些

推测更具有合理性。这里,我提出一个“参考坐标”的概念,即把我们所研究的问题作一种相对的定位,方法是从传世古籍文献中找出关联性最强的资料作为“坐标”,但这一“坐标”又有一定的弹性,并不是绝对的,所以我称之为“参考坐标”。本着这一基点,对我先前所发表的意见有所坚持,也有所修正。

(一)墓葬时间及墓中文献成书时间的参考坐标

关于楚墓,中国考古界已发掘数千座之多。考古学界根据墓葬形制、随葬物品,以及其中的简帛字体等的变化特点,已发展出一套称作“考古发掘类型学”的学科。考古学界根据这些变化特点来确定墓葬时间。关于郭店一号墓的墓葬时间,考古学界大致确定为公元前350年至前300年,下限定在公元前278年,这一年秦将白起拔郢,“烧先王墓夷陵。楚襄王兵散,遂不复战,东北保于陈城”(《史记·楚世家》)。楚都纪南城废弃,贵族墓地遭到严重破坏,楚国贵族集团由江陵一带向陈城转移。这意味着纪南城公墓区贵族墓葬于此年终止。目前学术界比较重视考古学界的意见。而墓中的儒家文献,思想史界倾向于认为是在“孔、孟之间”。我本人通过研究也基本同意这样的意见。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墓葬时间以及文献成书时间可能较后。

墓中各种文献成书的时间,可能同时而略有先后,也可能并不同时。墓中文献有一篇文献提到子思与鲁穆公这两个历史人物,按照钱穆先生《先秦诸子系年》的考证,子思大约生活于公元前483年至前402年,鲁穆公开始执政于公元前415年^①,《史记》说鲁穆公在位33年,应该执政到公元前383年。“鲁穆公”为谥号,此篇文献既称其谥号,那公元前383年应当是此篇文献的上限。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郭店楚简中的其他篇章早于此上限的可能性。墓葬下限既然定于公元前278年,自然,墓中文献的成书不能晚于此下

限。这是一种保守的、较宽的估计。孟子的生平(公元前 390? ~ 前 305 年?)即在此时段之内。

(二)墓主身世的参考坐标

儒学兴起于中原,楚国一向是被称为“南蛮”的国度,本无儒学传授。墓葬中有儒学典籍,说明墓主生前研习儒学,并与儒学南宗有渊源,或墓主本人就是南传儒学宗师。就我个人的看法,更倾向于后者。

1. 郭店一号墓随葬品中有一漆耳杯,底部有“东宫之师”的刻铭,据此推断墓主可能是楚国太子的老师。有人提出,“师”可能是“乐师”或“匠师”,不一定是太子的老师。我以为,单就“师”字而言,当然可以有多种理解,但既称“东宫之师”,当以理解为太子的老师为允当,“乐师”或“匠师”不能称作“东宫之师”。而且同其他随葬品结合起来看,墓主随葬品中既有许多儒学典籍,也反证墓主不可能是一般的“乐师”或“匠师”。

2. 随葬品中有鸠杖。依古礼,年七十授玉杖,八十、九十礼有加,赐鸠杖(杖端以鸠鸟为饰,鸠者,不噎之鸟,欲老人之不噎),墓中有两根鸠杖,可能墓主曾两次受赐鸠杖。以此推测墓主年纪在八十以上。

3. 据考古学界称,郭店一号墓的墓葬形制与竹简字体,同相距 9 公里的包山二号墓的墓葬形制与竹简字体完全一致。而包山二号墓可以确定为公元前 323 年。依考古发掘类型学的方法看,郭店一号墓的下葬年代应距此年代不远。

有鉴于此,我提出陈良作为墓主参考坐标。

《孟子·滕文公上》:“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陈良本是楚国人,有楚文化的背景,后来他到北方求学,成为学识渊博的学者。儒学的产地和大

本营在北方,陈良的儒学素养竟然连北方的学者也赶不上!《孟子》一书中虽未明言陈良曾做过太子的老师,但他既是“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的饱学之士,大概最有资格做太子老师。

问题还在于在公元前323年前后曾发生过什么事情。公元前322年滕文公继位,孟子于此年来到滕国,并于公元前320年离开滕国。在此期间孟子曾与投奔许行门下的陈相辩论。陈相本是陈良的学生,他来滕国的时间与孟子相近。孟子批评陈相从师数十年,“师死而遂倍(背)之”。这个“遂”字点明陈良刚死,陈相便背叛师门,以致招到孟子的痛斥。由此推断大约陈良去世上限在公元前325年,下限在公元前320年。上述的公元前323年恰在此两数之间。

而且,陈良既有“北学于中国”的经历,又有“数十年”教授的经历,其年纪想必较为老寿。

孟子还批评陈相说:“今也南蛮貊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背)子之师而学之……吾闻出于幽谷迁于乔木者,未闻下乔木而入于幽谷者。”这里“南蛮貊舌之人”虽是指许行,但既称楚地为“南蛮”,则在孟子看来当时楚地尚未完全开化,如陈良之“悦周公、仲尼之道”,“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因而被誉为南方“乔木”者,实属难能可贵。而且我们有理由认为“周公、仲尼之道”即儒学主要是由陈良传到楚国的。由孟子的言论,似乎可以认为陈良是南传儒学的宗师。从郭店一号墓随葬品中有大量儒家文献看,墓主即使不是陈良,也是与陈良有学术渊源关系的人,为此我提出陈良作为墓主参考坐标。

如墓主是陈良,应年长于孟子。我们假定陈良卒于公元前320年,而其生前得授鸠杖,那么他的享年至少八十岁,那么他的生年应在公元前400年之前(我希望有可能的话,考古学界对墓主的年龄作一次科学的鉴定)。

那么,陈良是哪位楚太子的老师呢?我们翻阅一下资料,知道楚怀王太子横,即后来的楚顷襄王在公元前328~前299年为楚太子,陈良去世时间既在公元前325~前320年期间,可以说他是太子横早年的老师。当然,前提是陈良真的曾做过楚国太子的老师。

(三)文献类别的参考坐标

下面我们来探讨《郭店楚墓竹简》中的儒家文献可能属于哪一类著作。这些儒家文献大体上可以认为是孔子“七十子及其后学所作”,但具体落实到哪些人和学派呢?

1. 以《荀子·非十二子》之语为参照,审查《郭店楚墓竹简》内容

我们研读郭店楚墓竹简的儒家文献,有一重要发现,就是《荀子·非十二子篇》批评子思、孟子的许多话,句句藏锋芒,不是无的放矢的。依笔者的浅见,《郭店楚墓竹简》中至少有三篇曾是《荀子·非十二子篇》所指涉和批评的内容,即《唐虞之道》、《缁衣》、和《五行》。下面次第论之:

(1)荀子批评子思说:“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儒家所许为“王”者,为王道之“王”,其当之者为尧、舜、禹、汤、文、武。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所祖述者为“先王”,所宪章者为“后王”。荀子主张“法后王”,因而批评子思、孟子“言必称尧舜”、“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所谓“不知其统”,是不知尧、舜、禹之间的“继统”原则,即认为子思一派相信上古有“擅让”制度。《郭店楚墓竹简》中的《唐虞之道》一篇所讲的正是擅让之道:“唐虞之道,(擅)而不传。尧舜之王,利天下而弗利也。(擅)而不传,圣之盛也;利天下而弗利也,仁之至也。故昔贤仁圣者如此。”而《荀子》一书有针锋相对批评“擅让”说的文字:“世俗之为说者曰‘尧、舜擅让’,是不然。天子者,势位至尊,无敌于天下,夫有谁与让矣!……曰:‘死而擅